

台灣組織及個體販毒網絡之質化考察*

馬財專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本文以網絡分析中的概念與觀點探討台灣販毒內在網絡關係所形成的交易脈絡，著重在販毒過程中組織與個人所產生毒品販賣網絡建構的考察。研究發現販毒過程中，毒品社群間的互動必須兼顧強連結的信任及保持弱聯繫的彈性，以強連結的信任來拓展市場及以弱聯繫的彈性來規避市場上的風險。此外，個體吸販毒者之間存在著遞移式的分享關係，以及販毒網絡關係發展存在著個體與組織之間的斷耦性質。斷耦性的阻絕功能得以避免檢警在稽查毒品時，產生抓粽子現象的發生，因為一個節點的失風可能會造成販毒系統的瓦解。

其次在信任機制及行動網絡仲介者角色與功能探討上，不同販毒或吸毒階段網絡的改變，使得個人信任機制在不同階段承載角色產生不同的轉變。在區隔化的交易脈絡中，仲介者形成吸販毒者網絡關係連結中的載體。在互惠的經濟邏輯與社會關係交錯發展與限制下，促使販毒者產生不同的行動思考脈絡。此外，不同的鑲嵌過程出現於販毒「初期」交易活動的發展階段，並促使吸販毒者將行動深化在透過關係所產生的交易經驗脈絡之中，促使交易行為產生穩定的發展。因此，純粹的市場交易缺乏毒品交易所需要的信任，但完全封閉的販毒網絡又侷限了市場的擴張，此種既鬆但又連結的網絡關係正符合毒品販售交易的需求。本文透過網絡概念的運用，藉以釐清台灣販毒關係的脈絡發展。希望此販毒過程的初步檢視上，能經驗性的安置與補足網絡分析在犯罪社會學領域的詮釋空間。

關鍵字：網絡分析、鑲嵌、弱聯繫、仲介者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91-2412-H-032-003 之部分成果，初稿曾發表於 2004 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感謝會中陳端容與邱瑜瑾教授給予本文之相關建議。此外，更必須感謝兩位匿名與編委會審查人所給予的寶貴意見，協助本文尋索到適當之定位。最後必須感謝本文執行過程中各監獄的受刑人及管理人員等相關的受訪者，提供相關寶貴之資訊與協助。

收稿日期：98 年 4 月 14 日；接受刊登日期：99 年 1 月 18 日

壹、緒論：另一個生活世界

在社會系統中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生活世界。犯罪的世界是一種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的世界, 在犯罪世界中的組織成員及其活動, 其實亦是活生生的社會次系統, 也隱性的充斥在我們生活周遭。

—— Bauman (2000: 26)

我們存在的生活世界是一個多元社會次系統所組合而成的社會, 次系統之間隱然存在著不易逾越的範界。誠如犯罪社會學家 Block (1994) 所指出, 「犯罪的世界」應被視為一個緊密的社會次系統, 系統中組織及個體都存在高度的連結關係。組織性犯罪集團也因組織內部封閉所產生的排除效應, 使得集團內部產生結構的分化與發展的壓力。近幾年來, 全球犯罪手法與型態不斷的推陳出新, 從個別型犯罪到組織性犯罪型態¹的改變,²對整體社會的影響或干擾程度日益擴張。李禮仲 (2004) 曾指出全球犯罪組織和販毒集團大量的雇用財務專家操作洗錢業務, 藉以阻絕執法人員的犯罪稽查。其實, 全世界的販毒組織皆在尋找低風險高報酬的犯罪環境。也呈現出不同學門對於販毒的集體性犯罪研究, 具有其研究意義的急迫與需要性。

透過初步的統計資料, 讓我們對台灣吸毒與販毒世界有一基本的輪廓與圖像。就吸、販毒的毒品犯罪發展脈絡, 台灣在 1989 年前以煙毒而言, 每年吸毒與販毒犯罪人數穩定的停留在千餘人左右; 然自 1989 年起人數開始成倍數成長, 主因由於部分毒品 (如安非他命: 簡稱安毒) 的自製過程較為簡易, 促使在台灣製造安毒的地下工廠日漸增加, 這些因素直接提高安毒在市

1 Abadinsky (1981) 指出組織性犯罪是一種營利或自保的結黨活動型式, 它深深的涉入非法活動, 並提供非法的財貨及勞務或以非法手段提供合法的財貨與勞務, 進而形成了市場的壟斷。

2 聯合國毒品控制與預防犯罪辦事處 (2004) 指出: 「在毒品走私、吸食毒品、軍火走私的組織性犯罪情勢日漸在全球各地發展, 即使是偶爾吸食大麻, 也使得各國身陷更長且更危險的圈套。」此外, 非法毒品走私係與組織性犯罪集團關係密切, 像毒品與槍械集團為圖厚利, 趨向組織化、國際化及智慧化之型態發展, 勢必會對各國的社會安全造成威脅。

場的流通量。此外，除了台灣自製之外，也逐漸自大陸走私進口，這些複雜的區域製造單位也相對建構出個體或組織的行銷網絡，這些擴散式的多元管道亦助長國內安毒的氾濫與流通³（內政部警政署，2005）。在流通管道的分析，戴志陽（2006）指出台灣由於毒品市場需求的激增，在警政機關高度稽查下，通路的擴散上產生重大的改變。近來由南部輸入往北部運送的輸送網絡儼然形成。吸毒除了人數的激增外，在毒品食用的類型上亦產生擴張，此情況使得販毒市場在供給與需求層面量上交易數量逐年的增加。販毒流通管道的複雜化，易使得市場毒品的大、小交易更加便利；然而管道的複雜化卻沒有增加毒品交易的穩定性，反而徒增其過程中的風險。

西方的犯罪研究，早期芝加哥學派中研究幫派的 Thrasher（1927）在其著作——幫派（*The Gang*）一書中，針對芝加哥 1313 個幫派份子進行研究，探討都會區小孩加入幫派問題，參與幫派的組織及活動（包括同儕活動與暴力活動）網絡，以及幫派次文化等問題，其發現為犯罪社會學中的幫派研究奠定下了基石。至於行動者為何會產生犯罪行為，Sutherland（1937）早期所提出的差別接觸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認為犯罪行為是「學習」而來的，多數從個人親近網絡中的團體，如家庭及朋友產生的犯罪學習。而 Sampson et al.（2002）及 Sampson and Wikström（2006）的陸續研究則指出，貧窮與社區網絡的崩解也容易對於行動個體犯罪行為產生關連性的影響。此外，針對犯罪組織研究亦存在不同的分析取向，Block（1994）與 Mcillwain（1999）從系統論觀念將犯罪集團視為一個社會系統，組織性內基於上層（upperworld）與下層（underworld）層級制度與個人關係所產生網狀式的行動交織與鑲嵌，形成組織性犯罪社會系統的基礎。除了上述系統分析討論外，Sudhir（2002; 2006）一系列關於城市內貧民窟社區的地下經濟研究到街頭組幫的制度經濟學層面分析，皆對販毒世界的社會結構及其運作

3 內政部警政署（2005）近幾年來透過治安機關積極嚴厲查緝，陸續破獲了 36 座提煉毒品的地下工廠，瓦解了部分販毒組織自大陸走私進口原料在台加工提煉毒品之根源。也迫使販毒組織將相關生產工作遷至大陸東南沿海各省，利用該地出產之原料如鹽酸及麻黃素直接製造安非他命，減縮了毒品在流通上的距離。再將安非他命製成品走私回台供應毒品市場需求，高度流通通路的建構，儼然形成了東南亞區域分工的生產及銷售的商品鏈。

方式有詳細的討論，也提供本文相當重要制度經濟脈絡的思考。從制度經濟脈絡的觀點，在販毒場域所形構的網絡關係差異對於毒品交易市場穩定性的影響，是本文認為值得勘探的重要主題。

貳、犯罪網絡：信任與鑲嵌

社會網絡著重於分析社會生活中，多元層級行動者所形成的行動交織與社會關聯的網絡型式。不管是從量化或質化的網絡分析，其概念多著重在「關係性資料」的分析技巧與概念上的發展 (Jackson et al., 1996; Scott, 2000)。關係性的重要概念在犯罪群體中又如何呈現？Jackson et al. (1996) 指出任何犯罪群體中重要的行動者 (actors)，未必於層級式的權力結構之中會佔有置高的權力位置。此外，由於英國警政系統缺乏完整的相關紀錄，使得網絡分析工具在英國犯罪學的研究中無法建構完整與充分的討論。在美國則有多元的網絡研究，例如 Baker and Faulkner (1993) 透過網絡親近性 (closeness) 探討非法犯罪集團的結構關係；而 Krebs (2001) 則透過網絡的領導結構 (degree of leadership) 來分析恐怖組織的犯罪結構，在其研究中指出，集中化的領導權威網絡結構使得犯罪組織在事件的行動參與上具有較佳的動員能力。

社會網絡提供哪些分析特點，有別於一般傳統犯罪社會學研究的拆解方式？也就是說，犯罪網絡的研究又如何根植於社會網絡的分析，進而提供了不同的解說取向。在犯罪社會學領域有關方法的選擇上，社會網絡分析多被以量化方式處理且運用於多國組織性犯罪群體的研究。諸如 Klerks (2001) 及 Carley et al. (2002) 的研究皆指出，網絡多重變異的關係分析有助於我們掌握動態犯罪網絡的結構特質 (structural properties)。而 Xu and Chen (2005) 等人所提出這些犯罪結構特質的掌握必須透過不同層次分析，包括節點 (node)、連結 (link)、群體 (group) 及整體網絡的層次進行犯罪集團的集體模式。因此誠如 Coles (2001) 所提及，社會網絡對組織性販毒過程與模式的探索，是透過網絡的分析觀點來提供潛在及有利的證據，根植於網絡的分析，進一步勾勒與描繪出犯罪組織集群在某些犯罪過程的關係性質。當然這

些「研究取向」上使用端賴研究過程及對象所產生的選擇。

隨著犯罪社會學於網絡取向研究上逐漸成熟，諸如 McAndrew (1999)，Mcillwain (1999) 與 Coles (2001) 等人對組織犯罪的網絡研究，從理論層次跨越至經驗分析在犯罪研究可能產生的適用性。近期的犯罪網絡相關研究 Xu and Chen (2005) 則逐漸在應用層面上將網絡分析運用在集體性犯罪網絡的經驗探索上。從規模型式來理解集團的活動，販毒過程從大、中及小盤所形成的組織網絡，進行毒品的交易行為。此組織網絡的概念分析例如距離 (distance) 是直接指陳出空間結構上不同犯罪組織或個體之間可能形成的交換性流動及相互關聯性的影響 (related influence)。此外，犯罪集團因集中性 (centrality) 及權力結構所形成的領袖關係模式與群體聚合 (grouping cohesion)，這些重要分析概念在犯罪網絡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討論空間 (Sparrow, 1991; Coles, 2001)。透過犯罪群體間關係性資料的分析，從事組織犯罪的學者指出網絡的分析，不管是從量化或質化作為分析取向，皆能有效的呈現出犯罪網絡結構 (Xu and Chen, 2005)。

相較於上述量化網絡的分析，近來英國部分網絡研究則建議從民族學式 (ethnographic approach) 的分析方式來進行考察，從 Jackson et al. (1996) 與 McAndrew (1999) 陸續研究指出，質化網絡的考察反而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料並有助於對複雜網絡關係的確認與分析工作。本文希望釐清在販毒過程的行動過程中，因互動所建構的網絡關係性質與連結可能產生哪些發展型式。吸、販毒者如何透過團體之間所存在的弱聯繫方式取得毒品資訊，並藉以連結完整的流動通路，是販毒過程中相當重要的機制。以下將從網絡分析的重要概念在各型犯罪研究中所提供的分析進行討論。

Boissevain (1974) 早期的研究逐漸突顯出網絡分析在處理個體與組織之間犯罪關係的特質描繪中存在著特殊的功能。例如其研究指出網絡結構中的社會仲介者 (social brokers) 承載或形成人與人之間「間接與直接」接觸所產生的連結點。這些重要的仲介者搭建起了個人、團體與結構之間因社會與文化差異所形成各種鴻溝的橋樑。因此，仲介者容易成為網絡結構中各群體的節點，這些節點的連結更易促進各類型網絡結構個人及集體行動者的互動行為，進而減少團體內及團體間所存在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

(Aldrich and Whetten, 1981)。基本上，較複雜的販罪組織之間，通常較有可能存在仲介者，藉以維繫組織間的關係聯繫，並在毒品擴散過程中扮演著穿針引線的重要功能。

結構網絡的串連除成就彼此重要成員的結構關係互動之外，更需透過彼此之間存在的溝通橋樑，才能維繫綿密的互動聯繫，這也引發仲介者概念在網絡社會聯繫 (social ties) 的持續討論。仲介者在網絡結構中所扮演的橋樑角色更加突顯出其功能上的重要性，而他們所搭建的社會功能在於他們之間所呈現的社會聯繫，尤其是在弱聯繫所產生的擴散效應上。誠如 Granovetter (1973; 1983) 所提出兩兩之間聯繫的強度界定在於兩者之間接觸的時間、情感的強度、親密程度與兩者之間所存在的交換關係，透過這些因素的考察來進一步確定兩者之間所存在聯繫特質。因此，社會聯繫中的不同關係特質與模式，諸如強聯繫 (strong ties)、弱聯繫 (weak ties)⁴ 與缺乏聯繫 (absent ties) 皆在販毒網絡結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與聯繫功能。在販毒過程的組織分析中，強聯繫的網絡結構亦促使內部的行動者存在著相當緊密的互動關係。然而這樣的強度聯繫特質卻也相對使得他們之間的訊息類型與內容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而新訊息的取得則必須依賴與外在群體結構所產生的社會接觸。

針對社會接觸的討論，Milgram (1967) 的犯罪研究指出，犯罪網絡中社會性接觸 (social contacts) 並非任意或隨機發生的。相對的，對偶 (dyadic) 相互之間所產生的社會性接觸幾乎都可以確認是在個體熟悉的關係群體之內。在其早期的研究中，點出了網絡擴散效應下仍有其閉鎖性的獨特特質。而此閉鎖性亦存在於犯罪群體圈內人的特定類屬聚集上。諸多犯罪實證研究中發現，有些毒品犯罪集群在他們的領導者被逮捕之後，這些毒品依然四處流竄，並未受到絲毫的影響 (Punch, 1991; Jackson et al., 1996; Hobbs, 1997; McAndrew, 1999; Coles, 2001)。因為，在實際的犯罪防治與執行過程中，

4 Granovetter (1973; 1983) 以「自我」為中心的網絡聯繫，區分為強聯繫與弱聯繫兩種模態。行動個體彼此間直接的接觸為強聯繫；而透過其節點轉折所產生的間接接觸，則為弱聯繫。透過弱聯繫作為一種管道，可以將距離自我較遠的想法、影響力、資訊傳達給網絡系統中其他成員，因此擴散影響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逮捕犯罪組織首領的遏阻方式並未能直接摧毀這群犯罪集團所形成的網絡關係，因為犯罪網絡所呈現的是動態的結構關係。

面對台灣地區犯罪的演變發展，集團化與幫派化犯罪網絡結構的呈現是動態而非靜態的結構關係，此動態的連結會隨著每個階段與時間點所呈現的接觸與關係性質而產生差異，販毒過程中組織或個體的供需連結鏈亦會產生變動。因此，在研究範界的設定上若僅從正式的結構位置來加以限定，這樣的方式並無法清楚的界定出研究者犯罪網絡範界 (Coles, 2001)。誠如本文之前所討論的侷限，使得研究者在網絡資料的蒐集難以完整取得。甚至從過去若干相關的網絡研究皆指出在眾多犯罪網絡之間所存在的組織或個人連結關係要取得觀察與紀錄的資料是相當困難的工作 (Sparrow, 1991)；以及 Frank (2001) 利用文獻統計資料犯罪模型「預估與探討」參與犯罪的青少年網絡結構，也因資料呈現的限制使得在研究上未得到滿意的研究成果與發現。這些類近的研究，卻不約而同的碰觸到相同的研究限制。

西方社會組織化過程善於運用科層體制與權威式管理來形成其交易性的聯繫，進而獲取其交易的利益。誠如 Luhmann (2000) 延續其社會系統論的觀點，說明信任是對社會複雜性的一種化約機制，以便使得行動產生可能性。此外，人情與回報兩個因素在 Meyers (1997) 的跨文化論述中被認為是傳統到現代中國社會網絡建構主要的形成因素。此兩因素亦促使中國社會組織關係網絡的形成存在著緊密的相互性，而網絡關係亦提供個人及組織社會策略與行動選擇的依據。依照 Putnam (1995) 的說法，人們經由參加自願性團體而增加人際信任並且藉此學習集體行動所需的技巧。關連與信任的共生效果亦可能出現在個人整合進入犯罪集團的發展過程之中。

整體而言，台灣犯罪集團成功的運用網絡關係的連結，跨越了組織內可能存在的限制及範圍。在運作過程中，關係的深淺亦影響了販毒過程中合作關係與交易的互信基礎。信任的觀念運作在市場結構中，使得企業組織之間的穩定關係亦形成夥伴式的彈性網絡支援結構。誠如高承恕與陳介玄 (1991) 與陳介玄 (1994) 對台灣企業體系所形成的協力網絡中指出：台灣企業體間形成的信任所指陳的是「人際的信任關係」。相似的，本文將探索台灣販毒過程所存在的網絡關係及其內部的運作邏輯，是否亦會因人際信任關係產生的

強化，進而使販毒個體或集團間產生擬似的協力關係特質。值得本文注意的是，當網絡分析作為一種類理論的分析觀點時，買毒者與販毒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隱密關係，上述的人際信任／不信任在彼此交易買賣的過程中必然承載著重要的連結機制。

相對於信任在最近網絡研究的重要討論與發現，鑲嵌的概念則在社會科學領域討論已久，早從 Polanyi (1989: 116) 認為當社會變成了市場社會的附屬品，經濟便不再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鑲嵌在經濟領域的討論於 Granovetter (1973; 1985) 陸續研究中強調，經濟行動實為一種社會行動的建構。Granovetter (1985; 1990) 多年對新制度的反思提醒我們需注意，精心設計的制度或許可以藉由增加不法行為的成本而防範於未然，然而卻無法增加與製造信任，只不過創造出其替代物。這些針對經濟邏輯與社會關係的討論，試圖透過鑲嵌概念的討論，將社會關係因素帶回與作為經濟行為與活動的基石。這種以社會網絡當作經濟活動所隱藏的思考脈絡，在其 1992 年有關結構性鑲嵌⁵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與關係性鑲嵌⁶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的後續分析中取得更進一步的思考。關係性鑲嵌的討論亦經常運用於考察華人社會關於經濟行為與活動發展的特質分析，諸如 Hamilton (1996) 與 Orru et al. (1997) 以華人社會關係所建構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此外，鑲嵌也引發多元華人特殊網絡架構下的經濟社會學討論，例如高承恕 (1996)、陳介玄 (1994)、張荳雲 (1999) 及潘美玲、張維安 (2003) 的相關論述。

社會網絡著重於分析社會生活中，多元層級行動者所形成的行動交織與社會關聯的網絡型式。透過網絡重要概念進行質化分析，在歐美社會科學研

5 Granovetter (1992) 將人類社會網絡中的鑲嵌分為關係性與結構性兩類。結構性鑲嵌由正式交易關係所形成之網絡，是指關係網絡的整體結構；關係性鑲嵌指意圖掌握對偶交換 (dyadic exchange) 的品質，所形成的非正式個人網絡。在毒品交易市場中，指設的是經濟行動者個人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強調交易成員間的信任關係。從鑲嵌觀點指出個體的經濟行為易受各社會規範所影響，進而推論組織所產生的人際關係網絡對於個體行動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唯必須小心處理結構鑲嵌在交易過程中的問題，避免落入功能論述上的陷阱。

6 Granovetter (1992) 所提出的關係性鑲嵌則定義為由於人際互動的鑲嵌網絡，除了結構性鑲嵌的討論外，試圖以更完整的面向來掌握個體行動者在組織工作或社會人際互動過程所造成之鑲嵌狀況。

究已行之多年，如 Rosenthal et al.(1985) 對於早期婦女社會網絡的質化考察等重要著作，也漸為網絡學者所接受。以及在犯罪社會學研究領域中，如 Jackson et al. (1996) 亦是使用網絡重要概念進行質化訪查，指出犯罪群體重要行動者的權力結構關係所呈現的不穩定樣態。本文亦採取此一進路，以販毒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蒐集資料的困境中，以訪談的資料作為支撐，透過質化網絡的重要分析概念試圖掌握販毒過程中，個體與組織交互互動關係所進行的觀察。本文檢視了交易脈絡、仲介者及信任機制所產生聯繫關係的網絡指標在販毒過程所呈現的社會與經濟意義。從網絡分析提供確認、分析與解釋複雜的販毒過程所存在的社會系統與其獨特的關係特質。本文的經驗研究，乃透過多元的販毒者訪問對象來確認販毒者之間的關係性質。

參、目的、問題與對象

在上述分析概念的導引下，本文的目的乃是現今社會吸毒與販毒活動日漸活絡的現象，透過對「販毒過程」資料的蒐集過程，希望對集體及個體之間販毒模式的網絡關係進行勘探式的描述。本紀要透過質化網絡分析⁷ 概念上的操作試圖回應兩個主要的研究問題：(一)販毒者買賣活動過程中發展出什麼樣有別一般商品交易脈絡的關係型式？其所存在的風險為何？(二)個人信任及組織間仲介者在買毒及販毒的經濟行動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產生什麼樣態的關係網絡？本文透過網絡研究概念，檢視販毒過程中組織與個體行動者之間網絡互動關係模式的探索，本研究透過質化訪問的資料蒐集，試圖釐清販毒活動跨越時空限制的分析。Maxwell (1992) 曾指出質化研究在進行推論時必須區別「內部推論」與「外部推論」。因此，針對研究樣本反應的說明，透過「內部推論」對所訪談的販毒受訪者資料得以包含時空範圍內

7 數量與質化的網絡途徑皆將網絡當作分析的工具，所不同的為數量的途徑認為網絡分析為社會結構分析的方法。運用量化的方法，例如等級群集分析、密度表、區截模型，根據參與者的凝結性、結構的等值、與空間的代表，分析參與者的關係。而質化網絡的分析不僅重視參與者互動的結構，更重視的是發展的過程與趨向，運用質化的考察方法，例如深度訪談、內容與言談分析，尋索與瞭解人際或組織之間的互動系絡。

進行推論國內販毒市場的概況。雖然多數受訪者屬於小盤的販毒個體，在推論台灣整體販毒過程的運作上可能存在著限制，但希望本文所蒐集的資料有助於掌握台灣販毒網絡關係的描述。

本文透過 27 位受訪者所得到的資料進行分析。在網絡分析方法的選取上，則從自我中心網絡資料 (ego-centered network data)⁸ 的描繪，進一步勾勒與分析出吸毒與販毒個體之網絡的發展及其擴張的運作機制，並進一步瞭解其組織性互動網絡的結構模式及限制。然本文必須先行指出，分析販毒網絡限縮於行動的販毒活動，至於現今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毒品的販賣則不在本文分析範疇之內。

販毒過程的研究援用質化網絡分析的概念與方法，針對販毒過程所存在的組織與成員（販毒大、中及小販毒者與吸毒者）之間所存在的網絡關係進行考察。由於販毒集團的重要成員在接觸與訪問上存在著相對的困難與危險。本文透過因販毒罪刑確定，服刑於獄中的販毒者作為蒐集資料的主要來源，資料來自國科會研究計畫「台灣販毒過程——組織及個體社會網絡分析之初探」，資料蒐集時間自 2002 年 12 月至 2003 年 8 月。研究者在執行期間立意性抽樣與訪問在監服刑的 18 位受刑人（受訪者分佈為台北獄監：4 位，台中女子監獄：6 位，雲林監獄：4 位，嘉義監獄：4 位）；除了在獄中的販毒受刑人之外，本文另訪問 5 位已經獲假釋、保護管束在外（5 位：編號 19 號到 23 號受訪者）的販毒者。此外，於 2007 年為蒐集更周延的觀點來重建這個不易被觀察的組織結構，另加入了警政與輔導系統相關 4 位人員的訪問，合計共訪問了 27 位受訪者。參與本文的販毒受訪者並非由獄方加以選定安排，受訪者的販毒經驗皆經由研究者查閱獄中的法院判決書以作為最後的確認。⁹ 依照「量刑輕重」及「犯罪事實」兩個重要指標，量刑輕重得以推定販

8 Newman (2003) 指出網絡分析上有區分整體網絡資料 (whole-network data) 與自我網絡中心資料 (ego-centered network data)，網絡分析隨著資料收集界限與封閉性而產生不同選取的區分。

9 本文為求受訪樣本的代表性及有效性，研究者經由留置於獄方行政室的法院判決確定書的原始資料來尋索受訪者，透過判刑原始資料的確定，再尋求獄方加以安排受訪。經由研究者確定受訪者願意接受訪問的工作，避免獄方刻意安排受訪人選。此外，訪問過程中再次由研

毒者販毒量的多寡（大、中及小盤），以及犯罪事實紀錄來定位他們在販毒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透過監獄中不同刑期販毒者的安排，藉以控制受訪者含括大、中及小盤的販毒者，並試圖探索販毒過程之間的仲介者所承載的角色與功能。透過各層面受訪者的回應，拼織出各種販毒網絡中行動者的活動關係及釐清其所承載之角色。也由於這些受訪者身份上的特殊，更深怕受訪者畏懼誠實回答會加重刑責的顧慮，研究者透過監獄的教誨師告知受訪者，本文的目的與意義。並由研究者在訪問現場適度的隔離下，¹⁰ 進行訪談的資料蒐集工作。

從研究方法而言，質性研究的信度要回歸到科學哲學層次來討論，而不應該在測量工具運用層次來討論（Guba, 1990）。質性研究的信度要求並不拘泥用控制或固定不變的方法來達成，而是在維持研究穩定性，透過詳實記載陳述來提供合理的解釋，藉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這也是本文將訪談資料透過受訪者針對事件的描述與組合，呈現系統解析販毒網絡的訊息與交易。在表 1(-)中 23 位販毒受訪者的分類，女性監獄受訪者以 A01 至 A06 共計 6 位，男性監獄受訪者以 B01 至 B12 共計 12 位，另假釋在外的受訪者以 C01 至 C05 共計 5 位。

對於訪談資料的分析與處理，隨著紮根理論研究法的思考原則與處理技術。思考原則符合科學的邏輯，研究中將抽象的概念與具體的現象反覆地歸納、演繹與假設驗證，並利用登錄典範的原則不斷地進行「想像的比較」，這種比較必須從單位間或單位與現象間的互動關係著手才得以兼顧個人及結構層面；資料處理則使用開放式登錄、命名現象、撰寫並排列備忘錄等技術，尋求嚴謹的同時保有彈性地分析（徐宗國（譯），1997）。研究者依照研究目的及問題列出重要的核心主題，再安排核心主題內的主題、概念和單元，之

究者確定是否真正願意接受訪問。如果不願意接受訪問，為求資料的真實性，則從樣本中加以剔除。

10 獄方的監控系統為防止受刑人脫逃及訪問者的安全，監獄中的受刑人都不得離開戒護者的視線。因此，距離遠近不是問題，只要能看見受刑人即可。因此，研究者便主動要求在可看的見的處所，選擇較遠的地方進行訪問，以減少受訪者因過度的戒心，而影響訪問的回應內容。

表 1

(一)販毒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姓氏	年齡	性別	規模	販、吸毒類型	判決書中 犯罪內容	執行情況
A01	黃小姐	35	女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A02	林小姐	27	女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A03	林小姐	28	女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A04	陳小姐	27	女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A05	林小姐	32	女	小盤	海洛英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A06	陳小姐	33	女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1	楊先生	45	男	中盤	海洛英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2	王先生	41	男	小盤	海洛英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3	王先生	45	男	小盤	海洛英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4	林先生	37	男	大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	無期徒刑
B05	賈先生	40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6	張先生	40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7	李先生	42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8	蘇先生	43	男	小盤	海洛英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09	蘇先生	40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10	吳先生	48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有期徒刑
B11	邱先生	31	男	中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	有期徒刑
B12	蕭先生	52	男	大盤	海洛英與 MDMA	販毒與吸毒	無期徒刑
C01	吳先生	38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假釋管束
C02	黃先生	36	男	小盤	海洛英	販毒與吸毒	假釋管束
C03	余先生	31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假釋管束
C04	蔡先生	30	男	小盤	海洛英及安非他命	販毒與吸毒	假釋管束
C05	陳先生	40	男	中盤	海洛英	販毒與吸毒	假釋管束

(二)相關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姓氏	年齡	性別	區域	工作職務	工作內容
D01	許先生	47	男	嘉義市	刑事警察	主要為偵緝販毒
D02	蘇先生	36	男	台中市	刑事警察	主要為偵緝販毒
D03	楊先生	40	男	嘉義市	輔導師	假釋監督
D04	邱先生	34	男	台中市	教誨師	心理矯正

後便開始進行分類動作。核心主題、主題、概念和單元式分析的架構，透過逐字稿的分析切割出許多有意義的文句或段落，並加以歸類。但是，閱讀逐字稿時往往會發現與研究目的和問題相關的文句和段落，卻無法被歸類到研究者預先準備的分析類屬中，此時的分析就改成由有意義的文句和段落組成單元再向抽象的核心主題發展的過程。針對深具隱藏性販毒世界社會系統的考察，本文透過不同規模毒販行動者與相關工作職務受訪者交互對立說明的三角檢證方法來確認及驗證受訪內容的討論，以類屬型資料呈現方式加以分析處理。在信度¹¹與效度¹²的檢測上，透過上述相關成員訪問交叉資料對網絡重要概念之驗證與檢視工作，並利用監獄提供的法院判決書內容與訪問內容進行論述建構雙向檢視的穩定性，透過厚實的描述及研究者的省思及回顧藉以提昇探究內容的真確性。

肆、販毒世界的交易與行動脈絡

本文針對 27 位受訪者的訪問資料進行編碼，從網絡分析的概念之詮釋來呈現販毒過程中集團或個體之間所存在的活動與結構圖像。並透過訪問資料交互對照的釐清，藉以論證與回應研究所要探索的重要問題，包含販毒活動的互動過程所建構出的「合作」關係與網絡的連結；以及在買毒及販毒的經濟行動過程中信任機制及網絡中仲介者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除此之外，經濟互惠的行動邏輯與社會關係如何有助／有礙於交易活動模式的建構與發展？

11 Denzin and Lincoln (1994) 主張質性研究的信度可由幾方面來著手：(一)觀察的穩定性——研究者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是否可做出相同的觀察與詮釋；(二)平行模式——當研究者在觀察期間注意到其他現象時，是否還會對之前所見的現象做出相同的觀察與詮釋；(三)評分者信度——當另一觀察者以相同的理論架構觀察相同現象時，是否會以相同的方式加以詮釋。本文在此部分採取三角檢證方法，採用不同資料蒐集方法以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

12 外在信度可產生複製性的判斷而得；內在信度是可靠性 (dependability) 即資料的本身、取得清楚的交代，可由一致性 (concordance) 或由第三者相似結論的測量而得。本文外在效度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有效進行資料的描述與轉換成文字的陳述，增加資料的深厚描述。內在效度的準確性 (credibility)，則透過訪問資料交互驗證的真實程度來加以確認。

後續分析以四個重要的質化網絡概念，開始進入本文經驗資料的考察與論證。在研究方法的操作上，不管是資料的構成或研究工具的使用上，本文雖非使用典型之社會網絡分析，然而希望透過網絡概念在質化考察的運用，在避免過度推論的原則下，進一步窺探本文所要釐清隱晦販毒世界的互動關係模式。

一、販毒網絡的遞移¹³ (delivery) / 斷耦 (discontinuance)

活絡的毒品交易本為生活世界中地下經濟活動的一環。就經濟活動層面的考察，在毒品交易活動進行的脈絡中，訪問資料呈現出多數販毒集團或個體在不同層級的毒品販售流過程，有諸多受訪者反應，主要流通架構仍搭建在「熟識」的網絡關係之中，尤其是受訪者剛接觸到毒品的階段。然而從訪問資料所呈現，家族的強連帶在販毒過程中是被販毒者有意識產生高度區隔的，都不敢讓家人知道，也未透過家庭成員產生其他網絡的連結。除非是夫妻或男女朋友之間共同吸毒且販毒，才會於過程中強化此部分的連結。不同社會亦可能存在網絡的特殊性，Murray and Hutchings (2002) 的研究指出傳統中國文化結構的信任機制對交易行為的發展與影響可能是個迷思，因為華人的商業行為是建立在既競爭又不信任的基礎之上。從訪問資料所回應的毒品交易脈絡，本文認為販毒者與組織之間經濟活動的產生，部分是在社會關係維繫下所建構出來的行動結果；但傳統家族連帶並未成為支撐經濟交易網絡的重要支柱。

剛開始吸毒，怕的要死，怕被家人知道，怕被警察抓到——其實我有些藥頭朋友都是被家人檢舉抓去的。老實說，我們都知道家人都反對我們沾到這個東西。而且剛開始都是吃免費的，沒多久就被釣上了。剛開始一定都嘛是找自己的朋友買這些藥來用。自己多買

13 網絡的遞移來自於行動關係建構過程中所產生的流通，流通的過程包含毒品的實際交易及毒品訊息流通網絡的持續建構。行動者在毒品交易的經驗過程中得以藉此持續過程產生較為穩定的互動關係。

的藥，要賣給其他朋友一起用，也一定都嘛是找自己最熟的。不然哪敢賣啊！別人也不敢買啊！（A03）

染上這些東西，我也不願意。而且被親戚朋友知道，會很丟臉。才剛開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較膽小，我都是跟很熟悉的人買，也賣給自己比較熟識的朋友。之前，在買賣時，我都很小心。（B06）

我們常碰到一些女生或婦女，因為男友或先生吸毒或販毒而染上毒癮的，還有蠻多夫妻一起食用與販賣的。他們也彼此再介紹給自己熟悉的朋友，但是這麼危險（對她們來說）的擴散實際上增加了他們在吸販毒過程中沒有辦法控制的危險。（D04）

透過朋友介紹及自我尋找產生毒品流通區域上的擴張，朋友之間所形成的網絡遞移為販毒與吸毒者搭建起便捷的橋樑。若就行動系統層次上的類型化分析，有趣的販毒流通架構之中，受訪者所稱之「小盤」販毒群體（是由彼此認識的吸毒者所組成的集群）經由「分享系統」（sharing system），由互相熟識的吸毒朋友們集資購買毒品一起分享，此分享系統呈現於 A(04)，B(03)，B(05)，B(06)，B(08)與 B(09)多屬於小盤受訪者。尤其在毒品缺貨以及警政署加強稽查的期間，分享系統承載著毒品傳遞及避免毒品斷炊的功能。

我們一般都是用電話進行聯繫，確定好了之後，再交貨。因為交貨有時蠻危險，有錢時就會多買一點，跟朋友一起用，大家在貨品使用上都會互相幫忙，來度過時機。我真的沒有在賣毒品啦，只是朋友間彼此的“周轉”（分享）而已就被抓了，但是單獨吸食還是比一起吸食來的安全。（B09）

越多次的交易喔！對他們買方或賣的人都是很危險的。一群吸毒的人，他們都是買來大家一起吃，分來分去，當然有些吸毒的人還是會透過這些小額的買賣，雖然是分著吃，但最後還是要給錢啊。其實，被抓到的藥頭（販毒者）也是希望買能大量，盡量不要有太多次的交易。因為他們也很害怕。（D01）

大家都嘛是自己吸食及兼作販賣毒品（其實是買回來自己吸食，朋友緊急需要才賣一點給朋友）。所以事情發生時，也都知道是誰供出自己，有些是被朋友出賣的。(B03)

在分享系統中輪流由當時經濟較充裕的吸毒者單獨購買之後，再經由小額販售給同票吸毒者所形成的網絡集群，這形成販毒商圈裡相當普遍的交易行動及經濟過程。透過這些穩定的分享過程，這些原本可能不甚熟識的吸毒者卻建構出另一套「階段性」穩定互動的社會與經濟雙重蘊涵之網絡關係。這些小盤的毒品交易脈絡是鑲嵌在吸毒者以個人人際關係來完成彼此分享的社會基礎，相對的，這種閉鎖性亦搭建出避免網絡過度擴散的防火牆。雖然有這些防護機制的存在，然而在不穩定的毒品交易世界當中，販毒者處處仍存在著被出賣的風險。

我們平常在買賣毒品，多少自己也都有沾到一些。這個交易要相當小心的，有的時候賣給你不熟識的朋友，他動不動就把你咬出來，在事頭上，沒有任何情義可言。講難聽點，大家還不是都看在好賺的情況，去冒這個風險。(B12)

大家都是互相支援一下，不過熟識的人有時會變來變去。有時會有人搬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就斷了一些門路。這樣變來變去有時我們在分給別人吃時，危險性真的會增加很多。(B04)

買賣毒品，大家最好都不要認識太熟才能自保。因此，彼此買賣雙方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他們還是都會彼此小心提防，不要太囂張才能做好保密的工作。但是中大盤的就不一樣喔，他們是一分錢，一分貨，都只是在買賣而已。(B11)

尤其當貨源不足或資金缺乏時，分享系統的小盤內在交易成為吸毒者度過難關的主要行爲。然而這些網絡關係所建構的互動關係多存留在小規模交易層次與分享的友誼關係，也因此，分享系統容易因為吸毒者的區域移動使得分享網絡產生鬆散的現象。不同於小盤毒販交易在人際社會基礎的呈現，

中盤或大盤的販毒集團之間所存在的關係則多為經濟交易的伙伴關係，顯少建構出深厚的朋友關係。就組織網絡的社會考察，對於市場的控制與影響意謂著對市場社群內部結構優勢位置的競奪，此種結構優勢位置經常以網絡的性質呈現出來：市場行動者易形成封閉凝聚的團塊，享有穩定且彼此共利的聯盟優勢 (Gerlach, 1992)；或者，可以占有市場中不同聚落團體彼此不相往來的中間人位置以享有仲介與控制之便 (Burt, 1992)。換句話說，就販毒市場的交易脈絡上，當這些需求與交易模式的擴張之後，隨之而來便是仲介者在交易關係之間所帶來的穿流等功能。如就大盤販毒組織之間的網絡關係考察，根據 Sparrow (1991) 與 Coles (2001) 針對國外販毒組織的研究考察中指出，不同犯罪組織或個體之間所可能形成的交換性流動，相互關聯性的影響 (related influence) 相當強烈。然而本文從大盤販毒的受訪者 B(08) 與 B(12) 資料，卻指出台灣大盤間主要的販毒過程並未呈現有如國外販毒集團彼此間交換性流動的特性。因而大盤之間的交換性流動僅存在於小規模仲介者在組織的控管空間之中，得以藉由自我的人脈資源，尋找到小規模交易脈絡的發展空間。也因台灣從大陸及東南亞區域毒品貨源的充足，此區域集團的區隔性及流通管道的多元化都逐漸形塑出區域集團的獨佔。

她們都有自己的地盤，但從外面進來的貨都已經是從不同地方進來，我以前有時也這樣做。我知道一些在台北的大盤，但她們從東部，大部分從南部進來。都有人要護盤，要派人去接貨，對她們而言都是有門路的啦！但有時不免有黑吃黑的。(B04)

大的組織，他們都有各自的地盤，自己地盤的維護對他們的生意買賣很重要啦。從大陸貨品的輸入與輸出也都有固定的路線。大部分他們根本都不會缺貨，如果有臨時缺貨，才會跟自己較熟的角頭調一些貨。不過這樣的情況真的很少聽到。(B12)

整體而言，大盤販毒的內控機制仍然是十分嚴謹的，尤其如 D(04) 所指出組織針對內部成員所「製造」的毒品依賴，此策略也有效的減低因擴散所可能發生的風險。部分大盤區域的護盤動作，如果組織之間缺乏有力的仲介

者，便容易使毒品交易網絡產生區域跨越時，產生了擦槍走火的暴力現象與事件。部分販毒組織甚或與地方基層警力產生賄賂的關係，這些潛藏的關係建構在毒品的交易脈絡中形成了更為隱密的安全閥，藉以減低其交易過程可能存在的風險。

大家在賣毒的市場中都嘛是零零落落的，比較沒有什麼完整的組織。但是，在台灣，比如我在北部就曾經接觸過大的販毒組織，裡面各個地方都有人在負責那個區域，組織中的老大們，在管理裡面的人都很嚴格。不嚴格的話很容易死人的，如果哪裡發生了事情，都要自己負責。他們中間如果沒有人去走種（台語：穿梭遊說），會有很多事情發生的啦！（B04）

我們所輔導的案例，有很多原先也沒有吸食很多的毒品。但他們集團中的老大們都會一直提供給他們毒品。當他們越依賴毒品時，便意謂他們要更聽這些老大的話。有些集團都是用毒品在控制他們手底下的人，其實也不乏有人跟警察合作賺錢的。（D04）

在網絡分析概念中聚合層面的考察，販毒集團的集中性（centrality）及權力結構形成特定的領袖關係模式與群體聚合（grouping cohesion），如同B(04)所反應，這些現象僅在規模較大的販毒集團才會形成這樣的層級關係。因為販毒集團的組織首領皆透過毒品的供養來有效的控制集團內的眾多兄弟，進而形成共享關係。綜整販毒過程網絡關係所形成的初步圖像，初步建構出販毒過程中大、中盤與小盤之間存在著網絡關係的「斷耦性」，透過此斷耦特質維繫著組織內及組織間成員既鬆卻又連結（loosed-coupled）的關係模式，經由此斷耦性所構築的防火牆進一步規避在毒品交易市場所可能產生的風險。這些特質都呈現出販毒網絡有別於一般商品交易脈絡所建構的關係性質。透過這些重要網絡概念的特質分析，亦可較為清楚的釐清這種特殊的連結關係模式。若從交易層次的考察上，區域經濟交易是屬於較大規模的交易模式，皆在販毒集團的運作範疇之內；較之於區域經濟交易，中盤分貨之後所形成的交易規模在毒品交易的數量相對減少。在這些風險規避構築所形成

的斷耦機制中，仲介者穿流所形成的交易脈絡，便形成了毒品販售交易上相當重要的載體。本文將此體系運作的框架以圖 1 表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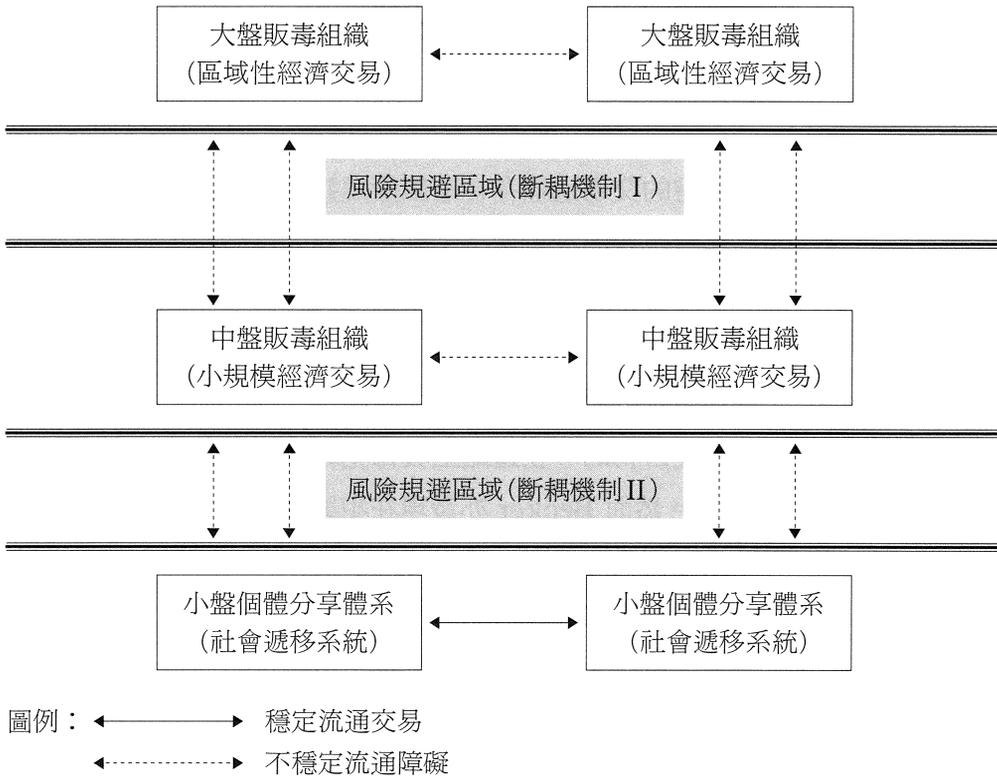


圖 1：販毒組織結構之斷耦性及遞移性

在毒品交易的市場中，流通機制的發展隨著個體或組織的重複性交易進而取得穩定的活動。然而販毒市場中，小盤個體的分享系統及各種規模的販毒組織之間所搭建的防火牆，使得交易過程得以規避風險的產生。在交易脈絡下對於買賣人的管控，卻可能在複雜的網絡擴散效應的挑戰下，雖有圖 1 所呈現的規避區域，仍使其交易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風險。

在我們處理的案例中，比較大型的販毒集團，他們在經營上都很小心。有的時候比較有風險的生意，他們寧可不作。這些較大組織的藥頭作生意都作很久了，所以他們都很小心謹慎，在分貨給中盤的

時候都這樣。所以我們經常在追線時，到了中盤就斷掉了。(D01)
講難聽一點，我們有時候貨源來自哪裡，我們也不太清楚。大家在
作這種生意，雖然想說被抓到就認了，但是還是會盡量，我賣給下
盤（小盤商）時也很小心啊。我啊，不能確定我就不作，除非是錢
追的緊的時候。(B11)

因此，從大盤到中盤的交易過程存在著風險規避的區域；中盤及小盤的
販毒者或組織也因為風險規避的考量產生了斷耦現象的區隔化，這些區隔形
成了交易活動過程中不同層次組織之間交互連結危機處理的防火牆。

二、信任(trust)／鑲嵌(embeddedness)

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自利的，在這點上吸毒犯罪者多半跟一般人並無太
大差異 (Becker, 1968)。然而 Becker 亦發現在犯罪科學研究當中，一般人的
犯罪行為通常可以找出例子來反駁一般人皆為理性自利，可見經濟學論述
並未全然將犯罪歸納於經濟學的理性自利中。現代經濟社會學對日用器物之
合法商品之交易脈絡之討論，Smith (1989) 曾指出市場價值與價格的認知與
表現過程，本為一系列的社會建構。在一般金融及拍賣市場的交易脈絡中，
理性利益的極大化，使價值與價格的建構皆存在於市場中行動者的認知結
構。現代社會中行動者的接觸與連帶多數產生於信任的防衛選擇機制之中。
在經濟社會學的討論中，Fukuyama (1995) 與 Whiteley (2000) 認為一般
化的社會信任會影響經濟交易與效率的產生，¹⁴ 當然信任機制的建立是一般
商品脈絡中穩定及持續市場交易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毒品市場的交易脈
絡，從考察資料卻顯示出有別於一般商品的交易脈絡與機制之運作。從受訪
販毒者的資訊，有異於一般交易市場指出熟悉所產生的信任是穩定行動者交
易的重要機制，其所呈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即是買賣雙方存在著一種默契，

14 Putnam (1993) 認為信任與規範及網絡一樣，都是社會組織的基本特徵，是鑲嵌在社會組織當中的社會資本。因為它們能夠促使社會行動的發展產生協調，進而提升經濟活動的效益。

彼此之間需維持著有點熟悉，又不能太熟的關係型式。因此，多次毒品交易的實際經歷，卻未必得以鞏固與強化彼此間的互相信任。如 Meyers (1997) 與 Mcillwain (1999) 所指出網絡關係節點的束縛，會促成對偶的固定互動模式，然而這樣的關係特質卻僅適合於初期吸毒與販毒者之間所存在的關係建構。在吸販毒市場中，不穩定的買賣雙方容易隨著(一)時期的改變；(二)需求的擴增及(三)管道的多元；此三因素而逐漸解構關係所存在的束縛，並弱化彼此之間所存在的信任基礎。有別於制度論述一般商品交易穩定關係的功能。因為在毒品世界中，過度熟悉的穩定關係容易在交易市場中引人注目，如 B(05) 所指出，穩定的信任關係容易增加警察循線或跟監的機會，徒增買賣雙方彼此的風險。此外，過度熟識的綿密網絡關係，容易因朋友的出賣，產生被集體逮捕的現象。因此為了規避此風險，彼此交易關係的維繫會隨著時間的穿流，在不同的階段當中，形成不同買賣關係模式的組合。

除了很熟的兄弟之外，我們跟其他的人都不敢太熟，不敢啦！現在警察抓的很緊，他們只要抓到一個，就開始嚴刑逼供，要他們一個咬一個，說是可以減輕他們的徒刑。有些人受不了誘惑，就把所有知道的朋友通通講出來了，有些根本不是事實也亂講，很可怕的。這些人真是太過份，沒有義氣可言。(C01)

有時候認識還是有好處的，彼此較可靠信任。像現在警方都很賊，他們都會偽裝成買方來釣我們，他們都不會偽裝成賣方。所以四處都有可能警察所佈的線，很危險，釣到賣藥的才是大功勞啊！(B05)

個人信任在買賣毒品的經濟行動過程中所產生的關係網絡，明顯呈現出在資訊不對稱的毒品交易市場，在經常是資訊不對稱的交易過程中，個體或組織的信任基礎仍然形成有利於交換和規避風險的隱藏性契約。這些以規避風險所產生的訊息交換在不同組織性犯罪群體的研究，如 Hobbs (1997) 與 Coles (2001) 的研究指出販毒所形成的資訊交易不對稱容易使得交易過程顯得危機重重。在 Arrow (1974) 與 Akerlof (1982) 的早期研究亦指出，此

隱藏性契約制度促使買方願意以高於市場價格來加以購買，或賣方願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來賣出，透過利他的操作來維持制度的進行及風險的規避。由此觀點思索，販毒行為承載風險的代價相當高，「信任機制」在交易過程中便成爲一種社會黏膠，藉以提高市場交易的效率與穩定性。在毒品交易市場中，由於存在高度隱藏性的風險，如何在風險的規避下進而完成交易，更成爲販毒者個體與組織所需面對的問題。然而檢警對毒品的查緝與滲透亦利用此強信任與弱聯繫的毒品市場機制，使用誘導方式來稽查販毒行動，這樣的介入亦間接對毒品交易市場的穩定度產生了干擾作用。然此介入方式雖會影響或破壞部分交易行動的發展，但在諸多販毒網絡的交易脈絡中僅是搭上單一的交易網絡，在錯綜複雜的販毒網絡中，並無損或動搖綿密的販毒交易關係。下列的談述資料中，突顯出個人信任在買賣毒品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承載與鑲嵌於社會關係脈絡的過程又如何與爲何呈現。

真正要尋找到穩定的來源或穩定的賣出管道都不是那麼容易。我們在賣的時候也很怕警察用「釣魚」的方式來欺騙我們說要買安咧（即安非他命）或四號（海洛英）啊。我們在過濾這些買方的背景及來源上，都要下很多功夫。（B11）

大家在買賣的時候，其實都很害怕。除非是急了，不然都還是會跟比較信任的管道來買。如果真的需要，熟識的朋友還是可以幫你調到貨，因為他們跟中盤都很熟。大家都嘛會互相幫忙。（C03）

從訪問資料中顯示販毒者對於毒品買賣過程的監控相當嚴格，因爲在毒品的交易網絡中（大盤→中盤與中盤→小盤），買毒品者來自四面八方的介紹，其背景都相當複雜且不可考。網絡模型認爲網絡結構環境可以爲個別行動提供機會或亦可能產生行動上相對的結構侷限（constraint）。因此毒品的賣方其實承載著多數的風險，爲減低所需承載的風險，「個人信任」（多數都由有交往關係的朋友介紹下才會跟買毒者進行交易）於交易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連結機制。然而有趣的是個人信任卻不見得能串連成爲組織的信任，因爲嚴密的大型販毒組織集團對所有新加入的中小盤販毒者都設定相當時間

的觀察期；¹⁵ 相對而言，中小盤販毒者對於其所販售的吸毒者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瞭解，觀察期通常較短。在交易發展的初期，隨著組織規模的大小產生不同組織對個人聯繫關係所產生的區隔，此過濾的區隔主要來自於販毒組織所建構的自我保護機制。這種組織信任機制的檢核得以讓販毒者規避部分的風險承載，長久而言，更有利於建構穩定的交易基礎。除了建構穩定的交易基礎之外，在交易過程中透過一些策略的運用，亦成為販毒交易過程所必須注意的，例如毒品與錢的分送，就能讓警方產生稽查或跟監上的困難，以及無法確定販毒的罪名。

有些買賣雙方為了保持安全，會利用計程車來送貨，來減少兩個一起被抓的危險。賣毒的會先叫買毒的將錢先送達，然後叫計程車司機幫他把貨物直接專人（司機）送到，錢跟貨品分開比較不會有危險。現在四處都有警察在跟監，從大盤、中盤到小盤，貨品跟金錢的交易，都有相當多新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被人贓俱獲，沒辦法以其他名義脫身。(B12)

至於在吸毒者毒品使用史的考察，信任機制也在吸毒發展階段承載著不同的重要性，這是與一般商品的交易脈絡迥異之處。根據多位受訪者資料的對照呈現有趣的兩階段發展。通常在吸毒初期，由於吸毒者經濟來源較為充裕，但卻相對缺乏毒品販售管道及人際網絡較為狹窄，因此多數吸毒者在初期階段僅會尋找比較能信任的人來購買，通常都是介紹者或共食者族群。畢竟買毒與販毒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隱密關係，因此人際信任在交易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初期發展階段。

剛開始大都是朋友認識然後牽線認識的。不擔心會斷貨源，因為很

15 這點類似的意見出現在相當多受訪者的訪問資料當中（包括 A03, B03, B06, B07, B10, C02, C04, D01, D04）。當然此觀察期的長短，主要來自販毒個體或組織所形成的內部監控系統，透過其對下線的瞭解與掌握，在交易過程中所進行的調整。

容易找到，朋友可以互相幫助與介紹。後來只要需要，即使只有一點點認識就可以去買藥（毒品），跟黑道打交道也沒有關係。(B05)

有些販毒集團不但專門吸收青少年來建構販毒網絡，甚至還由已入伍當兵的成員把販毒觸角伸到軍營中。他們都認為軍營中的弟兄比較可以信任，大家都在一條船上，較不會亂扯出來。(D02)

剛開始我或許因不熟，所以會只固定跟一兩個買，但後來我根本不會考慮一定要跟熟悉的產生買賣，很多有在吃的，都嘛這樣。到處都會有危險，怕危險就不要吃，不要賣。熟的就不會出賣你嗎？在這個市場，願意切賣毒品給我們的，就是朋友。(B08)

然而吸毒者在吸食「中、後」期階段，一方面因為對毒品交易市場已經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則因吸食過程逐漸經濟資源耗盡的因素，便會透過關係四處尋找便宜的毒品。在此時買賣的管道對這些市場老手而言已然不是問題，市場價格反而成為最重要的考量。也因為對於販毒管道的日漸熟悉與擴張，使得吸毒者購買對象的固定性逐漸產生浮動，且日趨不穩定。因此，販毒者在交易仲介的發展過程中，「信任機制」其實是防治風險的最重要管控制，尤甚於吸毒者對交易風險的管控。從另一層面之觀察，販毒者實際上更害怕管道或網絡的過度擴散，因為過度的擴張會導致他們無法有效的控制與過濾危機。信任機制不管是在買毒或販毒的初期階段，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事關的危險性更甚於商場企業之間的交易關係。然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資訊所呈現的是在吸食毒品中、後期環境的熟悉，源自於信任對象的逐漸擴大化。在基本的信任因素所搭建的網絡擴散效應下，很容易跟賣方產生交易的行為。

在吸毒與販毒的世界中，我們觀察到不同層次的鑲嵌作用影響著毒品交易過程的發展。鑲嵌概念從 Polanyi (1989) 的論述導出形式與實質經濟的區分，而從經濟到社會領域在 Granovetter (1973; 1985) 的分析中則強調經濟行動實為一種社會行動的建構。Coleman (1987) 與 Uzzi (1997) 皆指出網絡的社會封閉性易促使網域內部行動者彼此往來構成社會關係，相對的這層社會關係易對於個別行動者產生社會控制的作用。結構鑲嵌將經濟性的交易

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結構之中，穩定關係模式促使交易可能性的產生。結構性鑲嵌的概念在販毒者與集團初期交易活動的發展階段相當明顯。而毒品的交易亦透過此反覆經驗的形成使行動者將新的交易鑲嵌在過去的交易過程之中，而成爲交易行爲可能產生重要的參考指標。

當然有關係會較好，大家比較不會害怕。但是貨品的好壞以及價格也是大家都會比較的。畢竟大家的訊息都非常多，尤其是在吸毒或販毒有一段時間之後。但是在毒品的世界裡，要大家能相信誰，都要有長久的往來，不一定要非常熟識，但一定要經常往來，彼此才能產生信任。(B11)

建構信任關係成爲行動者產生行動的一種投資 (Tam, 1997; 張荳雲, 1999)，然而這種投資絕非短暫可以形成的，本文認爲應建構在長期的互動脈絡中，然而由於販毒組織的屬性（高度變動與不確定性的特質）及鑲嵌在這組織網絡中所產生因個體行動者所呈現不同的認同行爲。這種認同行爲上的差異根源自信任結構中買毒者與販毒者之間資訊的不對稱，便會進一步影響兩造雙方資訊的互動及未來「持續交易」中社會資本的投入，當然這種不對稱性所產生的阻障，皆可能因爲仲介者的交易與訊息之流動，而在不同階段使得交易脈絡產生差異性的發展。因此信任關係在部分販毒與吸毒者個體交易行動上扮演著重要機制，然而在部分訪問資料上，因爲風險規避所產生的信任干擾，使得部分大型販毒組織卻未必呈現這樣的現象。

他們組織內部都不太信任人的，有錢能購買大批的貨，就是大哥。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敵人？在這種局勢相當不安的社會裡面，沒有人或哪個組織是可以長期信任的，大家變來變去，有哪些朋友會變成警方的線民，你會知道嗎？所以那些販毒的大腳，都相當敏感，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立刻會跑到國外去。(B07)

在高度不確定的交易市場，去脈絡化的交易活動隱然成爲販毒過程中相

當明顯的特點。然而這並無法去除信任在此活絡市場中的重要性，誠如 Dasgupta (1988) 指出信任的意義在於對另一方行動者的「正確期待」。販毒者與吸毒者之間所存在的持續交易行為，一方的行動會影響另一方行動的決定。因此當個體行動者必須要作決定之前，另一方的行動便要受到監控，這種監控是隱性的存在於販毒過程之中。當互動過程對監控產生無能為力之時，也就更突顯出信任的重要性，然而這也伴隨著在之前段落，我們所提及信任可能承載的道德風險。¹⁶

三、穿流的個體／橋樑的搭建

台灣早期毒品的流入管道多經由船家以私人漁船，名為沿岸或近海漁業的捕魚，然而實為毒品的運載，以漁港或登陸沿岸為據點所形成的區域範圍成為早期販毒網絡擴散的範圍。本文在此段落，將透過訪談資料進一步來分析穿流於區域間的仲介者在販毒個體與組織之間所承載之角色與功能。

大部分的毒品還是以海上走私為主，若沒有我們船家的接應。這些大宗的毒品都不可能能夠大搖大擺的輸入。以港口所形成的販毒區域也就是這樣形成，北中南東各有據點，小的毒販也會知道到哪裡買可以買到純度較高的貨。這些吸毒或販毒的人，相當在意取貨的安全及貨的純度。(B12：表面職業，船家)

這些販毒集團因進口毒品的區位進而形成地域性的區位隔離。雖然販毒市場有區域隔離產生的現象，但是集團之間仍然有仲介者 (brokers) 穿梭於個人與組織交互層級的交易網絡中。雖然為數眾多，但實際的販毒流量卻是有限的個體行動者，所產生的小規模經濟活動。但這些穿流個體最重要功能並不是在於毒品攜帶的流通，而是在這些斷耦組織的連結中搭建起了販毒組

16 Coleman (1987) 指出在社會行動的理論分析上，個體與組織的行動發展過程中，信任是產生行動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然而這行動也相對的伴隨著同時性的風險。研究者認為這個論點相對的呈現出販毒市場活動中，買、賣雙方行動過程當中所存在信任與風險之間的弔詭。

織之間的「訊息橋樑」(information bridges)之功能,並且成爲重要的載體。至於組織間仲介者在買賣毒品的經濟行動過程中到底扮演何種角色,從資訊上可以得知,要成爲穿流仲介者的基本前提是必須先取得組織之間的信任,才能兼負起交易行動與訊息傳遞等橋樑的功能。這也是仲介者爲何能夠存在,甚或必須存在於販毒組織之間的原因。

有些人跟我們一樣自己也都要這些藥,錢比較多的時候便會「掛」(買)多一點,也想節省自己的本錢,所以蠻多會跑單幫一樣,到各處去賣給自己比較熟的朋友,但都不會跑太遠,而且量也不會很大。

(B01)

買賣毒品還是有些人會在各個不同地方跑來跑去,所以他們都會有些貨可帶來帶去賣。大家也都是因為他們所說的消息,知道大盤組織一些毒品的存貨及分佈的情況。(B03)

從訪問資料可歸類兩種主要的仲介者類型,一爲類似 B(06)跑單幫一樣,所持毒品量不大卻仍能穿梭於各區域之間販售毒品給其所熟識的販毒者。另一種如 B(11)持有較大量毒品數量的仲介者則遊走於各區域的販毒集團之間,成爲販毒集團彼此可能因暫時性貨源不足的情況,而產生組織之間互通有無的互補效應,然而此現象在區隔化的台灣販毒市場中卻並不常見。這些仲介者所遊走的販毒集團之間成員彼此都是相互認識,所表現與建立的是組織之間一種堪稱爲違法互助的情誼。但就結構位置而言,仲介者的存在亦有可能成爲毒品交易過程中最爲危險的節點,也使得警方經常透過這些節點的稽查來抓人,但在販毒組織斷耦範界的區隔下,在毒品區域價差很大及缺貨時,仍有需要這群穿流的仲介者作爲橋樑。

這些警察所要抓的對象都是販毒的,吸毒的他們根本不抓。若要抓吸毒的,就是因為他們可能會供出販賣給他們的人,有些在中間跑單的人就比較危險啦!其實警察的伎倆都一樣,只要你供出一個賣毒的人,就設法減輕你的徒刑,為抓到賣毒的記點才多啊。所以都

嘛一抓就抓一掛，像副肉粽一樣。我也是這樣被供出來的啊！（B02）

受訪者所反應的「粽子哲學」，在販毒交易市場中，其實是每個吸毒與販毒者在進行交易活動之前，心中奉行的圭臬。檢警單位透過網絡關係系統的查察，在近幾年來破獲了相當多的販毒交易，然而在績效掛帥下，各稽查單位卻出現本位主義，或是相互踩線破壞默契，對於台灣緝毒工作是一個很大的阻礙（法務部，2004）。而這些組織或個人所形成的穩定輸送管道也是警政單位所要積極偵察或佈線的要點，有相當多毒品的交易都在這些流通管道中穩定的進行。販毒網絡關係中的直接或間接聯繫所產生的任何節點（inter-sectional nodes），都是檢警埋線所要稽查的主要對象。

誠如 Boissevain (1974) 指出，網絡結構中的仲介者 (brokers) 承載或形成著人與人之間「間接與直接」接觸所產生的連結點。仲介者在販毒過程中所承載的角色，會因其在犯罪網絡中所具有特殊結構位置，而較易取得其個人的利益與資源。從 A (03)，B (05)，B (10)，C (02) 與 D (02) 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指出，有部分的仲介者穿流於各區域之間進行小額的販售，而成爲網絡關係連結中「毒品與訊息」流通的載體。然而部分受訪者的談述指出，販毒集團之間大批毒品跨越區域的交易與支援並不存在，因爲多數區域集團缺乏毒品時都擁有相當豐沛的來源與進口管道。當缺貨時，集團便會提早自進口國走私毒品。規模較大的販毒集團，與本地製造商，運輸者及外地供應商之間所形構出來的國際分工架構，包括了種植、製造與運輸及銷售，從各區域到各國之間亦建構出綿密及穩定的互動網絡結構。¹⁷ 因此，販毒組織內的成員如果與外界相關團體存在著弱聯繫，則易提供連結鏈 (chains of link) 的產生與建立，這些連結鏈皆有助於團體之間訊息流動的產生。這些穿流的販毒者如何將自身的思考與其行動脈絡結合，是下一段落所要回應的主軸。

17 近年來國內在毒品犯罪的稽查，如美國緝毒署 (DEA)、澳洲聯邦警察署 (AFP)、日本警察廳 (NPA) 與國內調查局均有合作圍剿販毒。澳洲聯邦警察署 (AFP) 亦協助我國與柬埔寨、菲律賓等國緝毒機關合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毒品犯罪係一跨國 (區) 問題，絕非任何單一國家所能單獨面對，緝毒國際合作已成爲各國間之共識及潮流。

四、互惠雙利(reciprocal benefit)——經濟行動／社會關係

網絡分析的論述認為要瞭解社會中的個體，必須先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單從社會整體來分析個人行為，往往會忽略個體的特殊性與行動的動機(Fischer, 1977)。本文認為如同遞移效應一樣，行動個體本身會與社會結構不斷的產生關係與互動，在此發展過程中行動者可以自由選擇進行人際關係的互動，但行動的發展脈絡仍是受到個體所屬的社會脈絡所影響，進而呈現於複雜販毒社會中所能掌握的行動基礎，在販毒世界中這些行動將被進一步強化。

Milgram (1967) 指出，犯罪網絡中社會性接觸 (social contacts) 並非任意或隨機而發生的，而是與 Fischer 的論點一致，乃深受社會行動脈絡所影響。因此經濟與社會行動的發展，便搭建在個人意圖與制度結構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行動安排。人際網絡關係的發展，雖然可以作為經濟活動的基礎，甚至可能互惠共生，但是這兩者並非總是正向合和 (潘美玲、張維安, 2003)，而且親近性未必然會讓社會關係變成是經濟理性活動發展的重要手段。Lin and Dumin (1986) 亦曾指出行動系統的互動關係是由信賴夥伴所組成，基於彼此對互惠交換的期待，及共享福祉的責任。「互惠」是連結個別與組織行動體經濟行動與社會關係的關係類型，而販毒交易本就是一個複合經濟理性與社會關係的複雜過程。有別於一般商品的交易過程與考量，在高風險的販毒市場中，圈內的行動者更須在此過程中達成彼此的理性互惠要求，才能產生暫時信任關係的維持。由於販毒個體與組織所形成的斷耦性及雙元性，不管是吸毒或販毒者的行動擴展上，其行動邏輯都存在著不同的策略思考。例如從吸毒者層面的考察，其行動結構顯然是經濟邏輯遠遠超越了社會關係。然當其因毒品需求迫切的趨使下，當其行動結構是經濟作為導向時，更容易在交易過程中積累出不信任，甚或成為被出賣的來源。

純度與價格是大家認為買毒品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吸食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有些在剛吃時，會一定要跟熟悉的朋友買。但我們跟人家買或是賣給人家，大部分都是不熟識的朋友，經電話聯繫之後，

便相約交貨的地點。——其實最怕是很急著需要，四處亂買就很可能被釣到，或被人家利用。(A06)

吸毒者在尋找毒品的過程中（尤其在熟悉不同的獲取管道之後）並不會因為與誰熟識就固定跟誰購買毒品，其所考量是毒品的純度與價格問題。然而就販毒者層面的討論，此時社會關係顯然超過了經濟邏輯，販毒者會因為毒品市場不穩定風險的問題考量，¹⁸而對於毒品銷售過程中購買者的審核相當嚴格。販售並非有人出高價購買就賣，必須是其所信賴的熟顧客或經由他們所轉知介紹的購買者，才會進一步產生後續交易的行為。不論是個體或集團間所形成的販毒網絡關係，皆是立基於經濟理性活動基礎下所產生的行動網絡。

賣藥的人最怕賣到不熟的客人，他們很怕他們有賣藥的消息一直傳遞出去，到時候他就很難去控制這些風險的存在。至於買藥的，剛開始可能會小心，找熟悉的。久了之後根本就是來源一大推，需要的時候就什麼都不管了。賣的跟買的人有不同的思考，我們都很清楚。(C04)

除鑲嵌於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外，一般化的個人信任對這些販毒者而言，考量信任不僅代表個人交換關係中的徵詢觀察及監控行為的基礎，更在毒品販賣活動中建構一個便利的（以高速公路交流道為主）、降低成本與規範複雜（脈絡化的交易關係）、不確定的制度規範（由組織內部成員親自交貨取款的過程）的活絡且迅速的交易市場。

買賣越多次之後，人頭都越來越熟。賣毒時，最怕的就是交貨的時

18 由於稽查績點的差異，內政部警政署（2003）的查緝獎勵規定對於員警查緝到販毒者所獲取的績點較之於查緝到吸毒者為高。因此，近幾年來為防堵毒品販售日漸猖狂的現象，查緝小組的員警經常會假扮成吸毒者混進販毒集團之中。由使得販毒者在業務擴展上無不小心翼翼，並透過熟悉的社會關係來管制員警混入的風險。

候被警察跟監，人贓俱獲。所以為了避免這些危險，我們都約在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或鄉下很多分叉小路的地方，交貨與取貨。(B08)

由於販毒者也經常被警政機關查緝，導致毒品流通的輸送網絡產生時間性的斷絕。基本上，在此時仲介者的穿流也因而斷炊，相對透過這層關係的建構產生了有效的阻絕效應，避免查緝行動循著網絡關係產生連結的效應。因此，從諸多受訪者的反應資料中，呈現出這種經濟行動的風險也促使買賣輸送管道存在著高度的流動性。透過上述四個層面資料的整理與分析，讓我們初步理解販毒過程的行動發展脈絡，同時也讓我們重新描繪出販毒過程中，不同行動主體（個人或集體）在市場穿流的基本圖像及其規避在交易過程可能碰到的問題與風險。

伍、結論

社會的行動主體，當其跨越出其舊有生命圖像的範界時，便落入了另一個社會生活的世界。從早期 1929 年美國伊利諾州的犯罪社會調查便試圖尋索上層世界與下層世界的關聯，資料便顯示上層與下層的兩個世界存在著高度的共生連結關係。我們可以理解兩個世界之間所存在的社會網絡關係絕非是靜態的，其間所產生的系統連結與網絡的關係是因為內在及外在力量所產生的改變、調整與擴張。本文以販毒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蒐集資料的困境中，以有限的資料作為支撐，以質化網絡的分析概念試圖掌握販毒過程中，個體與組織交互互動關係初步的結構觀察。研究中檢視了交易脈絡、仲介者及信任機制所產生聯繫關係的網絡指標在販毒過程所呈現的社會與經濟意義。從網絡分析提供確認、分析與解釋複雜的販毒過程所存在的社會系統與其獨特的特質。本文的執行，在訪問對象上，透過多元的販毒者訪問對象回應內容的比對，進一步確認販毒者之間的關係性質。

針對販毒過程中，個體或組織之間是呈現什麼樣連結的問題？有別於既往社會網絡理論，如 Granovetter (1973) 在強連結與弱聯繫在職場尋找工作及經濟市場的關係性質之論述，毒品社群成員之間的互動，為避免風險所搭

建的防火牆之運作過程中，如典型的 C(05) 所述“我感覺買賣的過程中說實在四處充滿了危險，——除了警察釣魚，還有黑吃黑，——還是要經過多次真實的買賣經驗，彼此才能互相信任啊！而且不能鎖死只有一條管道啊，要有很多佈好的線路，才能生存下去，不然沒辦法生活下去的啦！”，這種必須兼顧強連結的信任經驗機制及保持弱聯繫的彈性空間，以強連結的信任來拓展市場及以弱聯繫的彈性來規避風險，本文認為如何保持這兩種張力的平衡，正是販毒網絡結構能否維繫的最重要因素。誠如我們所瞭解，個人與組織間所存在的社會網絡關係絕非靜態的呈現，它會因為內在與外在力量以及情境的迫使，而經常性的產生變動發展與擴張調整。

此外，在個體吸毒者之間存在著遞移式的分享關係，販毒網絡關係發展存在著個體與組織之間的斷耦性質。這些斷耦性具有重要的阻絕功能，得以避免檢警在稽查毒品時產生抓粽子現象的發生，因為一個節點的失風可能會造成系統的瓦解。而此現象亦阻礙了個體與組織之間產生跨層級的連結，使得不確定的販毒市場中，減少了毒品交易活動的風險，這是在此世界中行動者（包括個體與組織）所注意的交易法則。這種需要強化與穩定信任機制的高風險交易市場，隨時可能因為分享者被抓，而產生網絡聯繫上的缺口，然而本文亦觀察到交易管道複雜化的過程中，吸販毒者得以建構出另一穩定管道，藉以連結原先斷落的網絡關係。上述的特質，迥異於一般商業活動經濟網絡所建構的穩定基礎，更突顯出本文將網絡觀點帶入分析販毒此非法地下經濟活動的適切性。從表 2 中，本文試圖從多元的受訪資料中，進一步歸納出不同層次的行動者在吸、販毒的信任機制、交易網絡及穩定性與防火牆防衛機制之中承載之角色，以及其所產生的類型化分析與比較。

上述類型化分析提供不同層次販毒網絡的發展脈絡，此外，在信任機制及行動網絡仲介者扮演角色與功能探討上，於考察中呈現出不同販毒或吸毒階段網絡特性上的轉變，這意味著個體行動層次的信任機制在不同階段的承載，為因應需求上的調整而可能逐漸產生變化。而此個人信任的建構卻未必能得到組織的信任，因為嚴密的大或中型販毒組織集團會對所有新加入的個體小盤販毒者存在著長時間的觀察期。在仲介者的分析，部分仲介者穿流於各區域之間進行小額毒品的販售，這些仲介者也形成吸販毒者網絡關係連結

表 2：行動者在販毒交易脈絡中類型信任、脈絡與穩定性之比較

行動者	信任機制	交易脈絡	網絡關係之穩定性	防火牆
組織	中下游長期穩定建構所產生的信任，較為強化	建立在分化式的分工與訊息傳遞，以便利風險之阻絕	區域內的網絡關係較為緊密與穩定。區域外的網絡關係較為彈性，但缺乏穩定	多重管道上的斷耦性及嚴密的監控，透過區域隔離產生阻絕
仲介者	連結與信任上串連之橋樑	穿流於交易脈絡下的行動者，交易脈絡所產生的鑲嵌	建構組織或個人之間所存在的連結機制並強化其網絡之穩定性	跨界穿流於防火牆之間流動者，本身亦同時存在阻絕之作用
個人	行動者個別經驗化之處遇與建構，高度分享系統，較為脆弱	個別性彈性化的分散與風險控管模式	缺乏穩定之關係網絡，易因階段與時間變動進而產生轉化	以信任機制及社會距離之控管來搭建

中的載體，不管是在信任機制、交易脈絡及穩定性上皆存在著相當明顯之影響。但在販毒集團之間，大批毒品跨越區域的交易與支援並不存在，因為台灣區域性販毒集團在其缺乏毒品時，都擁有相當豐沛的來源與進口管道。集團間因地盤所形成的勢力區隔與劃分及勢力均衡的維持，在台灣是販毒的基本結構動力。最後在經濟互惠的行動邏輯與社會關係如何有助／有礙於交易活動模式建構的考察上，本文認為在互惠的經濟邏輯與社會關係交錯發展與限制下，使得吸毒者與販毒者在交易互動的考量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的思考問題。結構鑲嵌在販毒者與集團「初期」交易活動的發展階段相當的明顯，然此重複的交易卻促使行動者將新的經驗鑲嵌結構化在交易經驗，透過互動而產生固定化過程，進而使得販毒市場中交易行為產生穩定的發展。然因為趨避現象，使得販毒者會將社會關係與經濟活動建構出適度區隔空間，並得以展開戒慎的交易活動。因此，本文認為單純的市場交易較缺乏毒品交易所需要的信任，但完全封閉的販毒網絡又侷限了市場的擴張，此既鬆但又鑲嵌式的連結網絡正符合毒品販售交易的需求。

本文透過網絡重要概念的運用，藉以釐清販毒過程中個體與組織行動關係的脈絡發展。誠如 Sparrow (1991) 所言，從過去若干相關網絡研究皆指

出，在眾多犯罪網絡之間所存在的販毒「組織或個人」連結關係下，要取得觀察與紀錄的資料是相當困難的工作。在網絡擴散機制的類同與差異分析的操作上，必須針對不同類型的販毒者，將受訪者依性別或販毒者與販毒兼吸毒者作區分，並探索不同類型的販毒者所存在的差異特質。雖然本文在販毒過程的考察上並非傳統量化數理模型「典型」社會網絡分析的範疇與網絡資料及分析工具的操作，然而本文仍希望在有限經驗資料的輔助下，能提供我們對於販毒世界的交易過程有個初步輪廓與瞭解。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內政部警政署

2003 《警政白皮書 (92 年版)》。台北：內政部警政署。

2005 《警政白皮書 (94 年版)》。台北：內政部警政署。

李禮仲

2004 〈犯罪組織與網際犯罪——網際網路成爲犯罪組織「犯罪平台」〉，國政研究報告，財金(研)093-008 號。

法務部

2004 《法務部毒品案件調查統計》。台北：法務部。

徐宗國 (譯) (Anselm Strauss and Juliet Corbin 原著)

1997 《質性研究概論 (Basic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台北：巨流。

陳介玄

1994 《協力網絡與生活架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聯經。

高承恕、陳介玄

1991 〈論台灣中小企業之「彈性化協力企業組合結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行爲研究組織小型專題研討會系列之三」，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高承恕

1996 〈台灣中小企業轉型〉。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社會學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張荳雲

1999 《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台北：遠流。

聯合國毒品控制與預防犯罪辦事處

2004 〈世界毒品報告〉。2009 年 10 月 28 日，取自 <http://unodc.org//unodc/en/worlddrugreport.html>

潘美玲、張維安

2003 〈經濟行動與社會關係：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研究〉，《台灣社會學刊》 30: 51-88。

戴志陽

2006 〈新興金三角 販毒全球化〉。中國時報，2009年10月28日，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fsj/3711737>

B. 英文部分

Abadinsky, Howard

1981 *Organized Crim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Akerlof, G.

1982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7: 543-569.

Aldrich, H. and D. A. Whetten

1981 "Organisation-Sets, Action-Sets, and Networks: Making the Most of Simplicity," pp. 53-72 in Nystrom and Starbuck (eds.), *Handbook of Organisational Design: Adapting Organisations to Environments*. London: Oxford Press.

Arrow, K. J.

1974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s*. Oxford: Blackwell.

Baker, W. E. and R. R. Faulkner

1993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onspiracy: Illegal Networks in the Heavy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12): 837-860.

Bauman, Z.

2000 "Social Uses of Law and Order," pp. 23-45 in Garland, D. and Sparks, R. (eds.), *Criminology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G. S.

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2): 169-271.

Block, A.

1994 *Space, Time, and Organized Crim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Boissevain, J.

1974 *Friends of Friends: Networks, Manipulators and Coalitions*. Oxford: Blackwell.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rley, K. M., J. Lee, and D. Krackhardt

2002 "Destabilizing Networks," *Connections* 24(3): 79-92.

Coleman, James

1987 "Toward and Integrated Theory of White Collar Cri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2): 406-439.

Coles, Nigel

2001 "It's Not What You Know—It's Who You Know That Counts: Analysing Serious Crime Groups as Social Networks," *British Journal Criminology* 41: 580-594.

- Dasgupta, P.
1988 "Trust as a Commodity," pp. 49-72 in Die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 Denzin, N. K. and Y. S. Lincoln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Fischer, C. S.
1977 *Network and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 Frank, O.
2001 "Statistical Estimation of Co-offending Youth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23 (3): 203-214.
-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Gerlach, Michael L.
1992 "The Japanese Corporate Network: A Block-Model Analysi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105-139.
- Granovetter, M.
1973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1: 201-233.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91: 481-510.
1990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y and an Agenda," pp. 614-634 in R. Friedland and A. F. Robertson (eds.),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ress.
1992 "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 pp. 25-56 in Nohria, Nitin and Eccles, Robert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 Guba, E. G.
1990 *The Paradigm Dialog*.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Hamilton, G.
1996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New York: De Gruyter Press.
- Hobbs, D.
1997 "Professional Crime: Change, Continuity, and the Enduring Myth of the Underworld," *Sociology* 31(1): 57-72.
- Jackson, J. L., J. C. Herbrinck, and R. Jansen
1996 "Examining Criminal Organisations: Possible Methodologies,"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2(4): 83-105.
- Klerks, P.
2001 "The Network Paradigm Applied to Criminal Organisations: Theoretical Nitpicking or a Relevant Doc-trine for Investigator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 the Netherlands," *Connections* 24(3): 53-65.
- Krebs, V. E.
2001 "Mapping Networks of Terrorist Cells," *Connections* 24(3): 43-52.
- Lin, N. and M.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 8: 365-385.
- Luhmann, Niklas
2000 *The Reality of the Mass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xwell, J.
1992 "Understanding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2: 279-300.
- McAndrew, D.
1999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riminal Networks," pp. 52-92 in Canter D. and Alison 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ime: Groups, Teams and Networks*. Aldershot: Ashgate Press.
- Mcillwain, Jeffrey
1999 "Organized Crime: 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32: 301-323.
- Meyers, W. H.
1997 "Of Quinqing Qinshu, Guanxi, and Shetou: The Dynamic Elements of Chinese Irregular Population Movement," pp. 99-133 in Smith Paul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Milgram, S.
1967 "The Small World Problem," *Psychology Today* 22: 61-67.
- Murray, G. and K. Hutchings
2002 "Working with Guanxi: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on Business Networking in China,"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11(3): 1-8.
- Newman, M. E. J.
2003 "Ego-Centered Networks and the Ripple Effect," *Social Networks* 25: 83-95.
- Orru Marco, Biggart Nicole W., and Gary G. Hamilton
1997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st Asian Capitali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 Polanyi, Karl
1989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Punch, M.
1991 "In the Underworld: An Interview with a Dutch Safe-Breaker," *The Howard Journal* 30(2): 121-139.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664-683.
- Rosenthal, Naomi, Meryl Fingrutal, Michele Ethier, Roberta Karant, and David McDonald
- 1985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Nineteenth-Century Women's Reform in New York State," *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90: 1002-1054.
- Sampson, R., J. Morenoff, and T. Gannon-Rowley
- 2002 "Assess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443-478.
- Sampson, R. and Per-Olof H. Wikström
- 2006 *The Explanation of Crime: Context,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ohn
- 200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mith, C.
- 1989 *Auc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ue*. New York: Free Press.
- Sparrow, M.
- 1991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Analysis to Criminal Intelligence: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spects," *Social Network* 13: 251-274.
- Sudhir Alladi, Venkatesh
- 2002 *American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Modern Ghett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 *Off the Book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the Urban Po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utherland, Edwin H.
- 1937 *The Professional Thie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m, Tony
- 1997 "Sex Segregation and Occup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U.S.: Devaluation or Specialized Trai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6): 1652-1692.
- Thrasher, F. M.
- 1927 *The Gang: 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Uzzi, Brian
-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35-67.
- Whiteley, P. F.
- 2000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Studies* 48: 443-466.
- Xu, J. and H. Chen
- 2005 "Criminal Network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48(6): 101-108.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Networks of Drug Transactions in Taiwan

Tsai-chuan M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bor Stud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n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d contexts between drug transactions in Taiwan,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rug transactions in the social network system. We find th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verse drug groups rely on strong trust as well as weak and flexible ties. The strong trust helps to extend the drug market, and the weak ties help to evade transactional risk. In addition, the shared delivery system of individual drug dealers (traffickers) is characterized by discontinuance. The discontinuance avoids the group arrests of drug dealers when under monitoring by the police. The arrest of nodes (dealers)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drug dealers' organization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st and brokers, changes between drug dealers in different stages enhance the function of trust in divers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ransactions, brokers become the carriers within the network of drug dealers. Those drug dealers have diverse ideas, which create the limitations that mutually develop reciprocal actions under economic, log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Besides, the diverse embeddedness influences the primary stage of drug transactions and encourages the transactions to embed in the past experience and to stabilize their transactions. Therefore, the general transactions in the market lack of the trust of drug market. However, the network is framed by drug dealers, which limits the expansion of the drug market. The loosely-coupled network relationships tal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ransactions of the drug market.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criminal world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By exploring the dynamic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between individual actions and organized activiti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different analysis for organizational investigation in Criminal Sociology.

Key Words: network analysis, embeddedness, weak ties, brokers